

家長教育的成效評估： 設計、量度及相關議題

陶兆銘、姚簡少薇、蔡冠華

1. 引言

家長教育的重要性在香港愈來愈受認同，然而，探討評估家長教育成效的策略及方法的文獻卻頗為缺乏。本文嘗試討論若干相關議題，以補現存文獻之不足。首先，本文指出在評估設計方面需要關注以下三方面，包括：（1）過程與成效評估，（2）客觀與主觀成效評估，以及（3）「家長為本」、「子女為本」及「家庭為本」的評估。另外，根據分析若干本地研究工具，本文展示大部分的研究，均以量度親職實踐、子女行為及親子關係的轉變來評估家長教育的成效，卻較少針對父母生涯的成長及家庭功能的提升而設計相關的量表。同時，本文提出一系列可能影響家長教育成效的因素，其中包括參加者及家長教育工作者的背景，以及這些背景因素與活動設計的互為影響。本文希望透過全面探討以上各項議題，能發掘更多有用的資料，讓前線工作者更有系統地評估家長教育的成效。

2. 家長教育的定義和目標

香港自 20 世紀 70 年代末開始推行家庭生活教育（family life education），將其定義為一種社區教育，以預防性為主，目標是改善家庭生活質素、預防家庭解體、促進人際關係及提升社會意識（Working Group on Evaluation of Family Life Education Service, 1982）。家長教育（台灣稱為「親職教育」）一直是家庭生活教育的主要元素，亦是其內在基礎，兩者有着密切的關係（黃郁文，1996）。

現時，香港的家長教育主要由社會福利界、教育界及衛生署提供(Tam, Lam, Cheng, Ho, & Ma, 2001)。

傳統上，家長教育是指由家長教育專家所主理的一套有系統的課程與活動，以提升父母或將為人父母者的自我醒覺、增進其親職的知識，讓他們學習管教子女的技巧，改善親子關係(Fine, 1980; Harman & Brim, 1980; Lamb & Lamb, 1978; Venkataiah, 2001)。根據以上定義，家長教育的目標或範疇主要圍繞以下四個層面(Fine & Henry, 1987)：

- 輸入資訊 (information input)
- 改變信念／洞察 (belief-insight change)
- 獲取技巧 (skills acquisition)
- 解決問題 (problem solving)

在香港，家長教育的定義是：有關如何提升不同年齡階段子女的身體、智能及心理社會發展而需要的親職態度、知識和技巧，亦包含協助父母提升處理親子關係的技巧、溝通技巧、解難技巧，以支援其個人發展(C. Leung, Tsang, et al., 2003)。根據 C. Leung, Tsang, et al. (2003) 的研究，香港家長教育課程或小組主要建基於個人中心取向(如「家長效能訓練」)(Gordon, 1970)、阿德勒取向(如「系統性有效親職訓練」)(Dinkmeyer & McKay, 1989)、社會學習取向(如「正向親職」課程)(Sanders, 1999)、家庭系統理論(如「薩提爾模式」, Satir Model)(Roberts, 1994)及融匯取向(eclectic approaches)。

文獻回顧顯示，大部分外國或香港的家長教育課程、小組與活動，仍根據以上家長教育的定義和目標來規劃其內容。然而，傳統家長教育的定義及目標在近年來不斷受到批評和質疑，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首先，傳統的家長教育，主要「以子女為本」(child-focused)，即認為家長教育最重要之處是教導家長一套「有效」的教養子女模式，以解決出現在子女身上的行為問題。不過，父母本身的個人成長和親職歷程，以及其所賦予親職的意義卻少有提及。根據 Lam (2005)

及 T. T. F. Leung & Lam (2009) 的本地研究，很多父母都認為家長教育對家長的個人特質 (personhood) 及家長特質 (parenthood) 之反思和塑造更為重要。

其次，研究顯示傳統家長教育多集中傳授親職知識和技巧，但不少參加者卻未能掌握和善用這些知識和技巧，究其原因，主要是參加者未能深入明白這些知識和技巧背後的意義，以及它們與自身的關係(Hills & Knowles, 1987)。Chan (2000) 指出，要提升家長對親職的投入，關鍵在於協助家長重新敘述與反思他們的親職生涯，從而加強他們對親職的承擔，深化他們與子女連繫的體會。

再者，傳統的家長教育假設父母未能掌握親職的竅門，須由家長教育專家傳授相關的知識和技巧。然而，這個假設往往令家長將焦點放在教養子女的困難和所承受的壓力，對為人父母產生更大的焦慮和內疚，更糟的是令家長對自己失去信心。事實上，家長並不是一群無力者，他們透過敘述自己的故事，能重新確認自己在親職方面的成長、滿足感和能力，發掘內在與外在的資源，因此，Lam (2003) 及 Tam et al. (2001) 認為，家長教育應是一個家長充權 (parent empowerment) 的過程。

以上針對傳統家長教育的定義與目標而作出的反思及批判，對家長教育的設計以至成效評估有着重要的影響。舉例來說，傳統家長教育的論述多以子女為中心，容易令前線工作者、研究員、以至社會大眾傾向以管教子女的成效來評價有關課程／活動的得失，卻忽略了從更深入的角度，探討父母在參加課程／活動之後對親職身分的嚮往及肯定，又或從更廣闊的角度，了解他們的轉變如何與複雜多變的家庭系統和家人關係產生互動作用等。下文將有更詳細的分析。

本文從四方面探討相關的議題，包括：(1) 過程與成效評估；(2) 客觀與主觀成效評估；(3) 「家長為本」、「子女為本」及「家庭為本」的評估；以及(4) 影響家長教育成效的因素。從以上四方面的分析，本文將討論傳統家長教育的定義、目標與內容如何局限了評估的範疇和取向，並因此令我們無法更全面、更深入地評估家長教育的成效。

3. 過程與成效評估

評估／評鑑研究 (evaluation study) 是指有系統地應用社會研究的程序，以評估社會介入活動 (social intervention program) 的設計、操作與成效 (Patton, 1997)。評估研究的目標不單在檢討活動，更重要的是提出改善與發展的方向 (Rossi, Freeman, & Lipsey, 1999)。一般來說，評估研究應包含成效評估 (outcome evaluation) 及過程評估 (process evaluation) 兩方面 (Royse, Thyer, Padgett, & Logan, 2010)，而理論上，成效評估及過程評估均可用量化及質性研究方法進行。

表一：外國家長教育量化評估後設分析

研究者	研究樣本	量度向度
Tramontana, Sherrets, & Authier (1980)	10 項評估家長教育成效的研究	親職態度 親職行爲 子女行爲
Dembo, Sweitzer, & Lauritzen (1985)	48 項評估家長教育成效的研究	親職關注 親職態度 家長接納 家長同理心 親職行爲 子女自尊 子女行爲 家人關係
Medway (1989)	24 項評估家長教育成效的研究	親職態度 親職行爲 子女態度 子女行爲
Mooney (1995)	33 項評估家長教育成效的研究	親職態度 家長接納 家長同理心 親職行爲 子女自尊 子女行爲 家人關係

在外國，家長教育推行了超過數十年，亦已累積了相當多針對其實施成效的研究。但透過運用 ERIC、PsycINFO 及 Social Work Abstracts 等資料庫的搜尋，發現大部分家長教育成效評估研究均用量化研究方法進行成效評估，只有很少質性評估或過程評估的研究。表一嘗試列出幾項外國有關家長教育量化評估的後設分析 (meta-analysis)，每個後設分析研究均回顧及分析了不少有關家長教育的成效評估研究。

表一顯示了絕大部分研究均以不同向度，量度家長教育的成果，如親職態度、親職行爲、子女行爲及家人關係等，唯全部均屬於量化的成效評估研究，並未有回顧及分析過程評估研究。仔細搜尋資料庫後，我們發現四項相關的質性研究 (見表二)。雖然這四項質性研究都集中探討家長教育的成果，但卻在不同程度上包含了過程評估，亦即分析參加者在參與過程中的經驗、參加者對該課程／活動的評價、課程／活動如何達到預設的目標、以及如何有效地執行已計劃好的課程／活動等 (Patton, 1997; Royse et al., 2010)。

表二：外國家長教育質性評估文獻回顧

研究者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研究重點
Espinoza, Batt, & Meditch (1980)	家長	田野研究	(1) 課程內容，(2) 課程設計，(3) 導師，(4) 活動影響。
First & Way (1995)	家長	現象學研究	參加者的經驗和學習成果，包括：(1) 與其他家長一起分享，(2) 對親職意義有更深的體會，(3) 對親職更有信心，(4) 更愛自己的孩子，(5) 反思與學習親子溝通技巧，(6) 正面的情緒管理。
Wolfe & Haddy (2001)	家長	質性訪談研究	(1) 活動如何提升社會支援，(2) 活動如何增加個人醒覺，(3) 活動如何幫助改善親職技巧，(4) 活動如何達到充權。
Stone, Clark, & McKenry (2001)	已離婚的家長	質性訪談研究	(1) 參加者如何建構家長教育的知識，(2) 活動如何幫助家長，(3) 活動有效之處，(4) 如何改善活動。

由此可見，儘管外國現存大量家長教育的量化成效評估研究，但質化評估研究仍相當缺乏；而現存的質化評估研究同時包含了成效評估及過程評估兩部分，相比之下，過程評估這部分更顯得少之又少。

在香港，過去 30 年雖然推行了有大量家長教育活動，但有系統地進行家長教育成效評估的研究卻非常罕見。文獻回顧顯示，直至目前共有九個評估家長教育課程或小組的研究，而大部分均以量化研究方法進行成效評估（見表三），其中只有三項研究包含了質化評估或過程評估（見表四）。

表三：香港家長教育量化評估文獻回顧

研究者	研究設計	樣本	研究結果重點
曾潔雯 (2004)	前測— 後測	初中學生 家長 (N = 26) 高小學生 家長 (N = 36)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親子平行小組」對減低初中學生家長的親職壓力有顯著作用。 「親子平行小組」對調整初中學生家長眼中孩子的親子觀念有正面影響。 「親子平行小組」對提升初中學生家長的夫妻關係滿意度有顯著作用。
C. Leung, Tsang, et al. (2003)	前測— 後測	父母 (N = 201)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整體來說，家長教育活動能有效減少兒童行為問題及親職壓力。 活動成效與主持活動的工作員之學歷及工作員經驗、活動之理念、目標子女之年齡、活動節數等有密切關係。
Education and Manpower Bureau & Department of Health (2003); 另見 C. Leung, Sanders, Leung, Mak, & Lau (2003) (兩者屬同一項研究)	前測— 後測 控制組 (隨機分派)	父母 (N = 69)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正向親職」課程對改善兒童行為問題有顯著作用。 「正向親職」課程對改善父母管教模式有顯著作用。 「正向親職」課程對提升親職能力感有正面影響。

表三：香港家長教育量化評估文獻回顧（續）

研究者	研究設計	樣本	研究結果重點
Au (2002)	問卷調查	父母 (N = 120)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Cyber 親職教育網的導師制度有助家長解決育兒的疑問。 Cyber 親職教育網的配套活動有助家長交流育兒心得。 Cyber 親職教育網有助家長增加育兒知識及技巧，以及掌握育兒的資訊。 (該項研究未有標示數據的統計顯著度)
S. K. Cheung (2001)	前測— 後測	父母 (N = 138)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家長在活動後就親職能力、親職同理心、親職滿足感及獲得的支持四方面均有顯著提升。 家長在過程中獲得的支持對其親職滿足感有重要影響。
Ho et al. (1999)	前測— 後測 追蹤研究	子女 (N = 25)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親職管理訓練」對改善親子互動及父母對親職的觀感有正面影響。 「親職管理訓練」對改善孩子的外顯行為問題較內在情緒問題有效。
S. K. Cheung & Yau (1996)	前測— 後測 追蹤研究	母親 (N = 31)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家長效能訓練」課程能增加父母聆聽子女心聲及表達同理心的能力。 「家長效能訓練」課程能有效改善親子關係。 家長愈能聆聽子女心聲及表達同理心，親子關係愈好。
香港小童群益會 家庭生活教育組 (1995)	前測— 後測	家長 (N = 31)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與你的孩子更親近」課程能幫助家長增加對兒童心理的認識。 「與你的孩子更親近」課程能提升家長聆聽子女意見時的能力及技巧，以及管教子女的耐性。 對參加者來說，幫助最少的是提升管教子女的信心。
Kwok (1994)	前測— 後測 控制組	父母 (N = 16)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系統性有效親職訓練」對母親的親職態度、知識和技巧有正面影響。 但對父親來說，只有親職知識有正面影響。

表四：香港家長教育質性評估文獻回顧

研究者	研究設計	樣本	研究結果重點
曾潔雯 (2004)	追蹤性訪談 及聚焦小組	初中學生 與家長、 高小學生 與家長、 社工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家長及學生均認為「親子平行小組」有助他們改善親子態度、知識和技巧。 家長及學生均認為參加「親子平行小組」有助親子關係的改善。 整體來說，社工對該計劃持正面的評價。
Education and Manpower Bureau & Department of Health (2003)	聚焦小組	參加者 (父母) 及小組促 進者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參加者及小組促進者均認為計劃的成功之處在於親職技巧的教授、參加者與小組促進者之間的討論，以及運用角色扮演及家課。 參加者及小組促進者均認為困難包括課程節數不足，且缺乏足夠的支援，而文化差異亦會產生一定的問題。
Au (2002)	聚焦小組	參加者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研究員歸納參加者針對系統設計所提出的意見，包括：網頁的吸引程度、搜尋及瀏覽的方便程度、穩定性，以及互動性等。 參加者認為應加強服務使用者及服務提供者的關係，從而更有效支援服務使用者。

值得注意的是，C. Leung, Tsang, et al. (2003) 及 S. K. Cheung (2001) 的研究是比較大型的研究（研究樣本超過 100 位家長，且抽樣屬全港性），但兩者均採前測—後測設計（one-group pretest-posttest design），並沒有安排控制組，因此影響其內在效度（internal validity），亦即不能就此證明該課程／活動是導致參加者改變的主要因素。換句話說，這種設計未能消除或有效減低其他因素的影響，如選擇樣本時出現的偏差（selection bias）、成熟效應（maturation）或測驗效應（testing effect）等（Royse et al., 2010）。

另外，Education and Manpower Bureau & Department of Health (2003)、C. Leung, Sanders, et al. (2003) 的研究是由政府部門（教育統籌局及衛生署）進行，曾潔雯 (2004) 的研究則是由社會福利署

觀塘區青少年服務地方委員會與該區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協調委員會委託其進行，而 Au (2002) 及 S. K. Cheung (2001) 的研究是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委託其進行，換句話說，個別家長教育課程／活動的評估研究並不多。從以上回顧及分析，我們對家長教育在香港已推行了 30 年有以下反思：

- 為甚麼評估個別家長教育課程或小組成效的研究仍相對缺乏？
- 為甚麼採用質性方法或進行過程評估的研究仍非常罕見？
- 假如服務提供者有進行成效評估，但大部分仍只作內部參考或檢討之用，這又對整個界別的專業發展有何影響？

總括來說，不論香港還是海外的研究，一方面指出了家長教育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因為研究數量不足或研究模式及全面性等問題，未能更深入地評估家長教育的成效。

基於篇幅所限，在餘下有關家長教育評估的討論中，我們將焦點集中於與量化研究相關較大的三個議題。

4. 客觀與主觀成效評估

在客觀成效評估方面，從外國及本地文獻顯示，雖然有不少評估家長教育成效的研究，但大部分均採用量度家庭及／或兒童不同情況的一般性量表和指標，而針對評估不同家長教育活動項目之特定目標、取向及內容的家長教育成效指標則仍有待設計。表五列出了本地研究使用的量表，其中只有 S. K. Cheung (2001)、S. K. Cheung & Yau (1996)、香港小童群益會家庭生活教育組 (1995) 及 Kwok (1994) 為針對評估家長效能訓練 (P.E.T.) 及系統性有效親職訓練 (STEP) 而特別設計的相關量表。

表五顯示，由家長教育工作者或研究員自行設計用作客觀評估家長教育成效的量表，只有 Parental Empathic Understanding & Responding Questionnaire (S. K. Cheung, 2001; S. K. Cheung & Yau, 1996)、「父母同理心及溝通模式」問卷 (香港小童群益會家庭生活

表五：香港家長教育客觀成效評估所採用的量度工具

研究者	量度工具	出處
曾潔雯 (2004)	• Abidin's Parental Stress Index -Short Form	• Burke & Abidin (1980); Abidin (1995)
	• Parent-Adolescent Values Scale	
	• Eyberg Child Behavior Inventory	• Tsang (1996)
	• Chinese Kansas Marital Satisfaction Scale	• Eyberg & Ross (1978) • Shek & Tsang (1993)
C. Leung, Tsang, et al. (2003)	• Eyberg Child Behavior Inventory	• Eyberg & Ross (1978)
	• Parenting Stress Inventory	• Burke & Abidin (1980); Abidin
Education and Manpower Bureau & Department of Health (2003); 另見 C. Leung, Sanders, et al. (2003) (兩者屬同一項研究)	• Eyberg Child Behavior Inventory	• Eyberg & Ross (1978)
	• Strength & Difficulty Scale	• Goodman (1999)
	• Parenting Scale	• Arnold, O'Leary, Wolff, & Acker (1993)
(2003)	• Parenting Sense of Competence Scale	• Gibaud-Wallston & Wandersman (1978, cited in Johnston & Mash, 1989)
	• Parent Problem Checklist	• Dadds & Powell (1991)
	• Relationship Quality Index	• Norton (1983)
Cheung (2001)	• Parental Satisfaction	• Gerard (1994)
	• Parental Efficacy	• Johnston & Mash (1989)
	• Parental Empathy	• S. K. Cheung & Yau (1996)
	• Perceived Support	• 不詳
Ho et al. (1999)	• Child Behavior Checklist	• Achenbach (1991)
	•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 臨床觀察
	• Parent Perception Inventory	• Hazzard, Christensen, & Margolin (1983)
Cheung & Yau (1996)	• Parental Empathic Understanding & Responding Questionnaire	• 自行設計
	• Index of Parental Attitudes	• Hudson, Wung, & Borges (1980)
香港小童群益會家庭生活教育組 (1995)	• 「父母同理心及溝通模式」問卷	• 自行設計
	• Index of Parental Attitudes	• Hudson et al. (1980)
Kwok (1994)	• Parent Attitude Survey	• Hereford (1963)
	• Adlerian Parental Assessment of Child Behavior Scale	• McKay (1976, cited in Newlon, Borba, & Arciniega, 1986)
	• Sharplay & Poiner Questionnaire	• Sharpley & Poiner (1980)

教育組，1995），以及 Adlerian Parental Assessment of Child Behavior Scale 和 Sharplay & Poiner Questionnaire (Kwok, 1994)，其餘大多是引用外國有關家長或兒童的研究中常用的量表。不過，這些量表是否適合用作評估特定的家長教育課程／活動，則仍有待進一步探討。

在主觀成效評估方面，其中一份最常用而專為家長教育設計的量表，是 Poertner (1985) 年的 Parent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用以評估父母參加家長教育課程或活動的滿意程度。量表共有 16 條題目，每條題目有四個選答項：答 1 (甚少可以) 得 1 分，答 4 (大部分時間可以) 得 4 分，如此類推。這量表由 M. B. Cheung (1996) 翻譯為中文，整份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數為 .89。這量表可分為三個次量表，包括：(1) 學習成果，(2) 導師的幫助，及 (3) 導師的表現。然而，這份量表正正反映了傳統家長教育的取向如何影響其評估方法。首先，在學習成果評估上，這份量表較為以子女為中心，如以下題目：

- 我現在更清楚對子女有甚麼期望。
- 我能夠更容易和子女交談。
- 我能夠更好地處理孩子的行為。
- 我認為自己現在對子女有更多認識。

以上題目顯示，傳統的家長教育太強調幫助家長認識子女並學習一套教養子女的模式以改善子女的行為，卻忽略了家長自己的需要和成長，以及提升他們對親職的投入與承擔。因此，我們建議在量表裏加上相關的題目，如「我現在更清楚要對自己身為父母有甚麼期望」、「我認為自己現在對為人父母有更大的承擔」及「我認為自己現在對為人父母有更多認識」等。

其次，傳統的家長教育亦十分着重由家長教育專家單向傳授有關家長教育的知識，或由導師協助參加者改變。這份量表亦顯示了在導師的幫助及對導師的表現評估上，過於以導師為中心，如以下題目：

- 當我做得好，導師便會告訴我。

- 導師幫助我了解自己在想些甚麼或在嘗試講些甚麼。
- 導師令學習容易。
- 導師幫助我作出改變。

以上題目着重導師的角色多於參加者的角色，以及強調導師如何幫助家長學習，卻忽略了家長在活動過程中如何確認和肯定自己的能力和方向，以及參加者之間如何互相促進與支援。事實上，家長教育亦應着重提升家長的社會資本，即鼓勵他們互相協助成長和解決問題，並建立社會網絡以面對為人父母的挑戰（Tam et al., 2001）。前線工作人員的角色應從活動或組織主導者慢慢變為促進者及輔助者，從而使家長在活動過程中獲得更大益處。因此，我們建議在量表裏加上相關題目，如「我能分享自己的親職歷程」、「我能鼓勵其他參加者分享親職歷程」、「我能幫助自己作出改變」、「我能鼓勵其他參加者作出改變」及「我能從其他參加者／父母身上得到支持和啟發」等。

當然，以「導師為中心」及以「參加者為中心」這兩種評估取向不是非此即彼的，只是着重點各有不同，值得進一步研究兩者如何混合使用。從以上的回顧及分析，家長教育推行者和評估者需要深思以下幾個相關問題：

- 一般來說，家長教育工作者會選擇使用哪些量度工具來評估活動的成效？
- 為甚麼他們會選擇那些量度工具？
- 現存的量度工具有何不足之處？
- 這些不足之處反映了現時家長教育較多根據甚麼目標及取向來設計其課程／活動？

以上問題帶出了現時家長教育多集中傳授教養子女的知識、方法和技巧，亦多以相關的量度工具進行成效評估，卻容易忽略了從更多的角度審視家長教育，如透過參加者互相分享，開拓彼此視野，探索為人父母的意義，從而互相鼓勵及建立支援網絡等，而在評估課程／活動時亦可參考或自行設計針對這些範疇的量度工具。

5. 「家長為本」、「子女為本」及「家庭為本」的評估

如前文所述，現時評估家長教育的研究集中以量度父母的教養態度、教養方式、教養知識、對親職課程內容的認知、管教行為、親子關係、親子溝通、子女自尊及子女行為等變項的變化來檢討其成效（Dembo et al., 1985; Mooney, 1995）。事實上，選擇研究變項要視乎特定的家長教育課程或活動的目標、取向和內容來設計，很難一概而論。正因為家長教育所涉及的範疇非常廣泛，評估研究的向度更需要相應增加，才能針對不同範疇的成效評估。

簡單來說，家長教育大致可分為「以子女為本」及「以父母為本」（parent-focused）。「以子女為本」的家長教育傾向以管教子女的成效來評價父母的親職能力，而「以父母為本」的家長教育則着眼於父母對親職的嚮往和投入。文獻回顧顯示，兩種取向有密切關係。父母本身的個人成長及所賦予親職的意義，深深影響其教養子女的態度與行為。若果父母對其親職的職分缺乏了解和承擔，又或在成長過程中經歷了心理窒礙或創傷，均容易增加其在親職實踐方面的困擾和焦慮，以至在教養子女上出現嚴重問題（Satir, 1988）。此時，集中幫助家長改善教養方法和技巧往往治標不治本，甚至令家長承受更大壓力。因此，家長教育應以促進父母本身的成長、探索為人父母的意義為主，以親職知識與技巧、解決子女行為問題為輔（林家興，2007；簡文英、卓紋君，2003）。

另外，Dembo et al.（1985）指出，從互動角度（interaction perspective）來看，親子關係是評估家長教育成效很重要的一個變項，因為父母的個人改變，能透過與子女的互動和情感交流的變化而得到充分體現。再者，根據家庭系統理論（family systems theory），發揮親職功能與親子關係對家庭整體發展和家庭成員之間的互動息息相關。換句話說，父母的個人轉變及親子關係的改善會帶動家庭系統的改變（Getz & Gunn, 1988; Mahoney et al., 1999）。因此，家長教育除了「以子女為本」及「以父母為本」之外，還要「以家庭為本」。綜

合以上所論，本文提出以五個範疇評估家長教育活動的成效（見圖一）。

圖一：「家長為本」、「子女為本」及「家庭為本」的評估——概念框架

親職生涯 (parenthood)：意義、個人需要、滿足感、投入感、效能感、承擔……	親職實踐 (parenting)：態度、事務、能力、方式、技巧……	子女成長 (child development)：自我價值、自我概念、自我效能、情緒、行為……
親子關係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聯繫、凝聚力、情感交流、溝通、糾紛處理……	家庭系統 (family system)：家庭功能、家人關係、家庭抗逆力、家庭支援、家庭規則……	

然而，透過文獻回顧，發現大部分本地使用的量表着重以量度親職實踐及親子關係的轉變來評估家長教育的成效，卻較少針對親職意義的了解與父母生涯的成長，以及提升親職投入和親子互動對家庭整體發展所產生的正面作用而設計相關的量表。圖二顯示，探討親職生涯的體會與家庭系統的轉變的量表可謂鳳毛麟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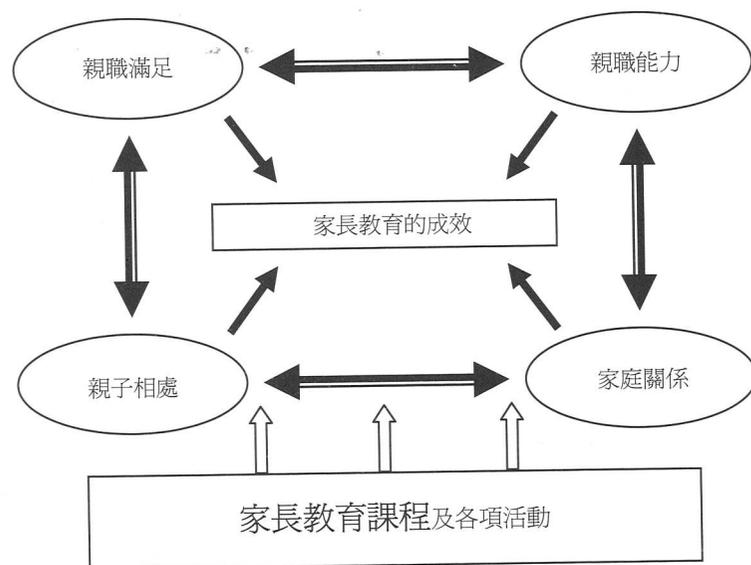
圖二：「家長為本」、「子女為本」及「家庭為本」的評估——香港經驗

親職生涯 (parenthood)：S. K. Cheung (2001)；C. Leung, Tsang et al. (2003) (親職滿足感)	親職實踐 (parenting)：曾潔雯 (2004)；C. Leung, Sanders et al. (2003)；C. Leung, Tsang, et al. (2003)；S. K. Cheung (2001)；S. K. Cheung & Yau (1996)；香港小童群益會家庭生活教育組 (1995)；Kwok (1994)	子女成長 (child development)：曾潔雯 (2004)；C. Leung, Sanders, et al. (2003)；C. Leung, Tsang, et al. (2003)；Ho et al. (1999)；Kwok (1994)
親子關係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曾潔雯 (2004)；C. Leung, Sanders, et al. (2003)；C. Leung, Tsang, et al. (2003)；S. K. Cheung (2001)；S. K. Cheung & Yau (1996)；香港小童群益會家庭生活教育組 (1995)；Kwok (1994)	家庭系統 (family system)：曾潔雯 (2004)；C. Leung, Sanders, et al. (2003) (婚姻關係)	

上圖顯示，只有兩項研究以量度父母的親職滿足感來評估家長教育的成效，亦只有兩項研究用婚姻關係的轉變來評估其成效。事實上，我們可應用量度家庭系統的量表來評估家長在參加課程／活動後其家庭系統與成員的互動有否變化，如運用 Family Assessment Device (Epstein, Baldwin, & Bishop, 1983; Shek, 2002a), Self-Report Family Inventory (Beavers & Hampson, 1990; Shek, 1998) 及 Chinese Family Assessment Instrument (Shek, 2002b) 等量表。至於量度親職生涯的量表，現存者多着重量度親職滿意度，而量度親職意義、家長個人需要、親職投入及承擔等的量表還不多見，值得相關人士自行設計及驗證。

當然，在實務上，我們不太可能亦沒有必要量度以上提及的所有向度，但我們可以針對不同家長教育項目的目標和模式，在研究中包含不同向度的某些元素，從而更全面評估家長教育的成效。圖三是本文提出的一個量化評估概念框架，以供參考。

圖三：家長教育量化評估概念框架



圖三所示，量化評估的自變項 (independent variables) 為家長教育課程及各項活動，依變項 (dependent variables) 為家長評量的親職滿足、親職能力、親子相處、家庭關係，以及它們的互動作用 (interaction effects)。根據以上概念框架，我們可以透過搜集資料及分析數據來驗證五個假設：

- 假設 1：參加家長教育的家長在親職滿足方面有正面影響。
- 假設 2：參加家長教育的家長在親職能力方面有正面影響。
- 假設 3：參加家長教育的家長在親子相處方面有正面影響。
- 假設 4：參加家長教育的家長在家庭關係方面有正面影響。
- 假設 5：參加的家長在親職滿足、親職能力、親子相處及家庭關係上有互動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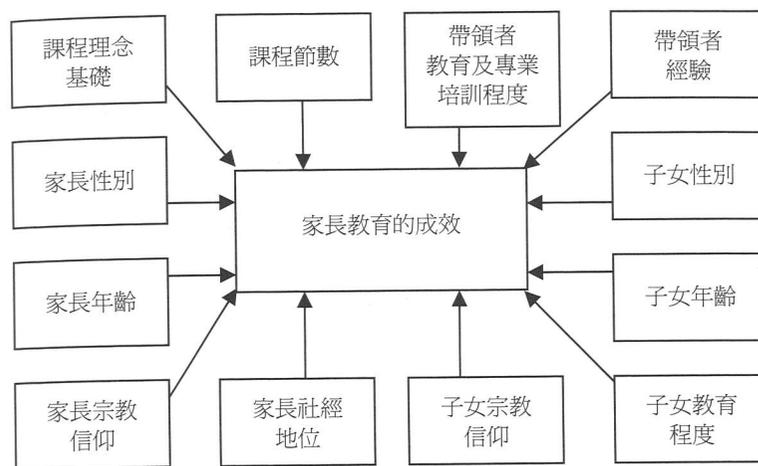
6. 影響家長教育成效的因素

Dembo et al. (1985) 及 Mooney (1995) 指出，家長教育的成效與不同因素有着密切的關係，這些因素可分為課程特色、家長特點及子女特點三方面。課程特色包括：課程理念基礎、課程節數、帶領者教育及專業培訓程度，以及帶領者於團體輔導及家長教育的經驗等；家長特點包括家長性別、家長年齡、家長宗教信仰及家長社經地位等；子女特點包括子女性別、子女年齡、子女宗教信仰及子女教育程度等。這些因素均直接或間接影響家長教育的成效，因此需要進行更多有系統及深入的研究。

在香港，現時只有 C. Leung, Sanders, et al. (2003) 及 C. Leung, Tsang, et al. (2003) 的研究探討一些相關的因素。因此，我們提出在進行家長教育成效評估時，可以分析圖四中的某些（不一定是全部）因素有否影響其成效。

在設計成效評估研究時，可考慮量化評估的自變項為可能影響家長教育成效的不同因素，依變項為家長教育的成效（包括親職生涯、親職實踐、子女成長、親子關係、家庭系統等範疇的轉變），從而作出驗證。

圖四：影響家長教育成效的不同因素：概念框架



7. 總結

本文嘗試回顧及分析香港家長教育成效評估的策略與方法，從中得出以下結論：（1）系統地進行個別家長教育成效評估的研究仍相當缺乏；（2）以質性方法或進行過程評估的研究十分罕見；（3）針對評估家長教育成效的客觀及主觀量度工具仍有待設計；（4）現存的研究集中以量度親職實踐、子女行為及親子關係的變化來評估其成效，卻忽略了親職生涯的成長及家庭功能的提升這兩個層面；及（5）探討影響家長教育成效的相關因素的研究並不足夠。

以上結論反映了香港現時所推行的家長教育仍以幫助父母學習教養子女的方法和技巧為依歸，並且着重由專業人士透過教育傳授這些方法和技巧予有需要的父母，以減低他們所承受的壓力及解決他們所面對的困難。然而，家長教育亦可以協助父母重整自己的生命歷程、培養其創建能力 (generativity)、肯定和發展個人在親職角色的潛能、以至令整個家庭系統及其互動更趨健康，俾能在家庭生命週期的各個階段作出合適的回應和調節；同時，家長教育亦可促使不同的

父母彼此守望，建立支援網絡或互助小組，一起面對親職的機遇、需要和挑戰。這種從更深入和更寬廣的角度思考家長教育的可能性，正開始影響家長教育成效評估方案的設計和量度，它可視為一片有待發展的領域。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沒有否定前人之努力，更無意紙上談兵，胡亂堆砌複雜無比的研究框架。反之，本文最希望做到的，是鼓勵各位家長教育同工盡量用可行而更全面的方法評估家長教育的成效，一同為「證據為本的家庭工作」(evidence-based family practice)出一分力。

參考文獻

- 林家興 (2007)。〈親職教育團體對親子關係與兒童行為問題的影響〉。《教育心理學報》，第 39 卷第 1 期，頁 91-109。
- 香港小童群益會家庭生活教育組 (1995)。《與你的孩子更親近：檢討研究報告》。香港：香港小童群益會家庭生活教育組。
- 曾潔雯 (2004)。《「家校合作——親子調和工作」計劃成效調查報告書》。香港：社會福利署觀塘區青少年服務地方委員會；社會福利署觀塘區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協調委員會。
- 黃郁文 (1996)。《親職教育概要》。台北，台灣：千華。
- 簡文英、卓紋君 (2003)。〈國內親職教育團體研究的回顧與分析〉。《諮商與輔導》，第 211 期，頁 2-10。
- Abidin, R. R. (1995). *Parenting stress index* (3rd ed.). Odessa, FL: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Resources.
- Achenbach, T. M. (1991). *Manual for the child behavior checklist and the 1991 profiles*. Burlington, VT: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University of Vermont.
- Arnold, D. S., O'Leary, S. G., Wolff, L. S., & Acker, M. M. (1993). The Parenting Scale: A measure of dysfunctional parenting in discipline situations.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5(2), 137-144.
- Au, C. F. (2002). *The cyberparenting project: An evaluation study*. Hong Kong: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Beavers, W. R., & Hampson, R. B. (1990). *Successful families: Assessment and intervention*. New York, NY: Norton.
- Burke, W. T., & Abidin, R. R. (1980). Parenting Stress Index (PSI): A family system assessment approach. In R. R. Abidin (Ed.), *Parent education and intervention handbook* (pp. 516-527). Springfield, IL: Charles C Thomas.
- Chan, T. S. (2000). *A narrative analysis of men's interpretation of their fathering experienc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 Cheung, M. B. (1996). *Report on the evaluation package of family life education parenting programmes*. Hong Kong: Hong Kong Family Welfare Society.
- Cheung, S. K. (2001). Parent education programmes in Hong Kong: Are they effective? *Hong Kong Journal of Social Work*, 35(1&2), 85-96.
- Cheung, S. K., & Yau, Y. L. (1996). Parent effectiveness training for Chinese parents: Adaptation and evaluation. *Asian Pacific Journal of Social Work*, 6(1), 30-42.
- Dadds, M. R., & Powell, M. B. (1991). The relationship of interparental conflict and global marital adjustment to aggression, anxiety, and immaturity in aggressive nonclinic children.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19(5), 553-567.
- Dembo, M. H., Sweitzer, M., & Lauritzen, P. (1985). An evaluation of group parent education: Behavioral, P.E.T., and Adlerian programs.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55(2), 155-200.
- Dinkmeyer, D., & McKay, G. (1989). *The parent's handbook: Systematic training for effective parenting (STEP)* (3rd ed.). Circle Pines, MN: American Guidance Service.
- Education and Manpower Bureau, & Department of Health (2003). *Process and outcome evaluation of the positive parenting programme in Hong Kong*. Hong Kong: Author.
- Epstein, N. B., Baldwin, L. M., & Bishop, D. S. (1983). The McMaster Family Assessment Device. *Journal of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 9(2), 171-180.

- Espinoza, R., Batt, K., & Meditch, A. (1980). *Parent educ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in American families*. Austin, TX: Southwest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Laboratory.
- Eyberg, S. M., & Ross, A. W. (1978). Assessment of child behavior problems: The validation of a new inventory.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Psychology*, 7(2), 113–116.
- Fine, M. J. (Ed.). (1980). *Handbook on parent education*. New York, NY: Meredith Press.
- Fine, M. J., & Henry, S. A. (1989). Professional issues in parent education. In M. J. Fine (Ed.), *The second handbook on parent education: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pp. 3–20).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 First, J. A., & Way, W. L. (1995). Parent education outcomes: Insights into transformative learning. *Family Relations*, 44, 104–109.
- Gerard, A. B. (1994).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Inventory (PCRI): Manual*. Los Angeles, CA: Western Psychological Services.
- Getz, H., & Gunn, W. B. (1988). Parent education from a family-systems perspective. *The School Counselor*, 35, 331–336.
- Goodman, R. (1999). The extended version of the 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 as a guide to child psychiatric caseness and consequent burden.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40(5), 791–799.
- Gordon, T. (1970). *P.E.T. parent effectiveness training: The tested new way to raise responsible children*. New York, NY: P. H. Wyden.
- Harman, D., & Brim, O. C. (1980). *Learning to be parents: Principles, programs, and methods*. Beverly Hills, CA: Sage.
- Hazzard, A., Christensen, A., & Margolin, G. (1983). Children's perceptions of parental behaviors.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11(1), 49–60.
- Hereford, C. F. (1963). *Changing parental attitudes through group discussions*. Austin, TX: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Hills, M. D., & Knowles, D. W. (1987). Providing for personal meaning in parent education programs. *Family Relations*, 36(2), 158–162.
- Ho, T. P., Chow, V., Fung, C., Leung, K., Chiu, K. Y., Yu, G., Au, Y. W., & Lieh-Mak, F. (1999). Parent management training in a Chinese population:

- Application and outcome. *Journal of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38(9), 1165–1172.
- Hudson, W., Wung, B., & Borges, M. (1980).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disorders. *Journal of Social Service Research*, 3(3), 283–294.
- Johnston, C., & Mash, E. J. (1989). A measure of parenting satisfaction and efficacy.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Psychology*, 18(2), 167–175.
- Kwok, L. Y. C. (1994). Systematic training for effective parenting (STEP): Its applicability for the Chinese parents of primary school children in Hong Kong. *Hong Kong Journal of Social Work*, 28(1), 22–30.
- Lam, C. M. (2003). Parent education: Revision and vision. *Asian Journal of Counselling*, 10(2), 147–168.
- Lam, C. M. (2005). In search of the meaning of parent education in the Hong Kong-Chinese context. In M. J. Kane (Ed.), *Contemporary issues in parenting* (pp. 111–124). New York, NY: Nova Science.
- Lamb, J., & Lamb, W. (1978). *Parent education and elementary counseling*. New York, NY: Human Sciences Press.
- Leung, C., Sanders, M. R., Leung, S., Mak, R., & Lau, J. (2003a). An outcome evalu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riple P-Positive parenting program in Hong Kong. *Family Process*, 42(4), 531–544.
- Leung, C., Tsang, S., Pang, R., Cheng, W., Chan, S., Lai, A., Ng, A., & Lo, A. (2003). *Parent education database in Hong Kong — A pilot study*. Hong Kong: Education and Manpower Bureau; Department of Health;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aritas-Hong Kong; Christian Family Services Center; & Hong Kong Family Welfare Society.
- Leung, T. T. F., & Lam, C. M. (2009). The warrants of parenting: Emotionality and reflexivity in 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d families. *Journal of Social Work Practice*, 23(3), 353–367.
- Mahoney, G., Kaiser, A., Girolametto, L., MacDonald, J., Robinson, C., Safford, P., & Spiker, D. (1999). Parent education in early intervention: A call for a renewed focus. *Topics in Early Childhood Special Education*, 19(3), 131–140.
- Medway, F. J. (1989). Measur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parent education. In M. J. Fine (Ed.), *The second handbook on parent education: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pp. 273–255).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 Mooney, S. (1995). Parent training: A review of Adlerian, parent effectiveness training, and behavioral research. *The Family Journal*, 3(3), 218–230.
- Newlon, B. J., Borba, R., & Arciniega, M. (1986). The effects of Adlerian parent study groups upon Mexican mothers' perception of child behavior. *Journal of Individual Psychology*, 42(1), 107–113.
- Norton, R. (1983). Measuring marital quality: A critical look at the dependent variabl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45(1), 141–151.
- Patton, M. Q. (1997). *Utilization-focused evaluation: The new century text*. Thousand Oaks, CA: Sage.
- Poertner, J. (1985). A scale for measuring clients' satisfaction with parent education. *Social Work Research & Abstracts*, 21(3), 23–28.
- Roberts, T. W. (1994). *A systems perspective of parenting: The individual, the family, and the social network*. Pacific Grove, CA: Brooks/Cole.
- Rossi, P. H., Freeman, H. E., & Lipsey, M. W. (1999). *Program evaluation: A systematic approach* (6th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 Royse, D., Thyer, B. A., Padgett, D. K., & Logan, T. K. (2010). *Program evaluation: An introduction*. Belmont, CA: Brooks/Cole.
- Sanders, M. R. (1999). Triple P-Positive parenting program: Towards an empirically validated multilevel parenting and family support strategy for the prevention of behavior and emotional problems in children. *Clinical Child and Family Psychology review*, 2(2), 71–90.
- Satir, V. (1988). *The new peoplemaking*. Palo Alto, CA: Science and Behavior Books.
- Sharpley, C. F., & Poiner, A. M. (1980). An exploratory evaluation of the STEP program. *Australian Psychologist*, 15(1), 103–109.
- Shek, D. T. L. (1998).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self-report family inventory: Does culture make a difference? *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 8(3), 315–329.
- Shek, D. T. L. (2002a). Assessment of family functioning in Chinese adolescents: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family assessment device. *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 12, 502–524.
- Shek, D. T. L. (2002b). Assessment of family functioning in Chinese adolescents: The Chinese family assessment instrument. In N. N. Singh, T. H. Ollendick, & A. N. Singh (Eds.),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child*

- and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Volume 2: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pp. 297–316).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Boston, MA: Elsevier.
- Shek, D. T. L., & Tsang, S. K. M. (1993).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Kanas marital satisfaction scale: Some psychometric and normative data.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21, 205–214.
- Stone, G., Clark, K., & McKenry, P. (2001). Qualitative evaluation of a parent education program for divorcing parents. *Journal of Divorce & Remarriage*, 34(1/2), 25–40.
- Tam, W. M., Lam, C. M., Cheng, H. M., Ho, S. C., & Ma, L. C. (2001). *The promotion of parent education in Hong Kong: A consultancy study final report*.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Tramontana, M. G., Sherrets, S. D., & Authier, K. J. (1980). Evaluation of parent education programs.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Psychology*, 9(1), 40–43.
- Tsang, S. K. M. (1996). *Father-adolescent conflict in Chinese families in Hong Kong*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 Venkataiah, S. (2001). *Basic concepts of parent education*. New Delhi, India: Anmol.
- Wolfe, R. B., & Haddy, L. (2001). A qualitative examination of parents' experiences in parent education groups.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and Care*, 167, 77–87.
- Working Group on Evaluation of Family Life Education Service. (1982). *Report on 1981 base-line study on evaluation of family life education service*. Hong Kong: The Central Guiding Committee on Family Life Education,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 Social Research Center,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